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史料卷

我这个人
——
塞克回忆录

塞
克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主 编 张福贵
史料卷主编 李霄明

目 录

我这个人	001
忆南国社的几次演出	091
我和冼星海	100
忆小友——剑啸	102
哈尔滨忆旧	105
我是没有离开过艺术的人	108
时代的歌手	周而复 114
革命艺术的先驱	晏 甬 133
遗憾与哀思	戴碧湘 140
塞克年表	145

我这个人^①

我想先说说我的历史特点和思想特点。在历史特点方面，我有许多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这些特点都是我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等原因造成的。比如我小的时候正是“五四”时代，受这个影响很大，反映到我身上就是争取个人解放，反对封建。我念高小的时候，放学回家后，为婚姻的问题争吵不休，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就叫我脱下身上的棉衣到街上去跪着。这事在我心里种下很深的仇恨，父子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我离家后和家里断绝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离家以前自己已经周密地考虑过怎样生活，怎样学习，要走什么道路，样样都考虑过了，所以离家之后，再没有回头的余地。是生是死，是好是坏，全凭自己去走了。

我开始走入社会，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那时的进步刊物都大量介绍马列主义的理论文章。我编哈尔滨《晨光报》文艺副刊时，有个叫苏子元的给我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里赞成反帝反封建，自己一心向往的是学习文艺，也不懂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中，我走的地区多，生活变动大，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更没有亲属，再加上战争影响，每离开一个地区，就完全

^① 塞克的这篇自述是根据他生前的录音和遗留下来的手迹材料整理出来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隔离开了，一隔开就是十年二十年，这也是我的历史上的一个特点。

我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论搞什么职业，从没有把职业当成生活的目的，只把它当作生活的手段。因此，对待职业问题，我是很不考虑的，遇上什么做什么，我的真正目的是如何在艺术上取得成就。



我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出生，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人。家住霸县县城南五里后卜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离大清河有十来里地远，周围是一片平原，少山缺水，我家住的是泥土平房。我父亲叫陈绪堂，识几个字，在北京学过手艺，回到村里就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还当过七八十户人家的村长，装得像很有学问的样子，但是，一点儿新思想也没有，做事特别封建。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不到四十岁，他的脾气也很拧就是了。我在小学念书，在县里念到高小毕业，那时高小毕业就等于是个秀才了。

我祖父喜欢喝酒，有时也灌我。喝醉了就发脾气、闹，我父亲就劝他，说喝酒不好。他从此就不喝了。以后，来了客人我父亲陪着喝酒，祖父就不在家里，自己到庙台上坐着去。

有一次，祖父带着我拔麦子去，干的时间长了，我嫌累，累得腰疼，我就哭了，那时就十来岁。他就说：“你不干就不干吧，你不干有你爹养活你，我不干就没有饭吃。”他很能干，五十八岁死的。他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祖父的名字记不得了，也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父亲三兄弟都是农民，分家时一家分了四亩地。我的妹妹叫小翠，比我小五岁。

我们老家是河北省文安县，老人讲话是安徽口音。爷爷那一辈从文安县搬到霸县，祖坟都在文安县大清河边。霸县和文安县隔一条大清河。我念过几年私塾，那几年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写字，

一个是珠算。最初我都学得很好，很用心。写字我很喜欢赵体，自己有一本赵孟頫字帖。但是，我父亲却反对我写赵体，把字帖给撕了，他给我买了一本欧体字帖，说是欧体有劲。从他给我撕了字帖之后，我就不再写毛笔字了，要不，我现在的字写得那么坏！珠算，我很用心学过，有一次为学珠算我跟父亲吵架，从那之后，我就再不练珠算了。

我有个舅舅，小的时候曾跟我讲过一件义和团的故事：他从小练武术，他的武器是把匕首。县里派人去抓他，他就把红木烟袋杆在腿上一折两截，双手拿着当匕首，没有抓着他。听说他是因为杀了一个县里的什么人，把杀死的那个人扔到河里头了。舅舅哥儿俩，弟弟也练武术。夜里回家不叫门，拿着红缨枪一触地就跳过院墙。我记得他家墙上挂着大刀片。到了冬天，老头子领着年轻人就在庙前练武。舅舅的手法非常准，在大清河里叉鱼，一截竹竿头上安上铁尖，后面拴上很长的绳子，在河边离老远看见鱼，唰的一下抛出去，就把一条大鱼叉上来了。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在私塾念书，他又叉鱼，我就用柳条穿上，拎着一串鱼跟着他。说起叉鱼，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打家雀，在苇塘里我看到一条白鳊，我不认识，以为是“长虫”，吓得我直喊：“长虫！长虫！”一个农民闻声过来了，他用两个指头捏着拎走了。

我这个人要怎样就得怎样，谁说也不行。有一年夏天，我们家里盖房子。吃了午饭，帮工的人都坐在外面玩。另外有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小孩，大人们就说：“你跟他摔一跤，你摔不过他。”我心想：“我怎么摔不过他？不行，得摔。”一摔就把我摔倒了。我说：“这不算，再来一次。”结果我又被摔倒了。这回没脸再起来了，就趴在地上哭哇，哭哇，怎么也不起来了。有人就把我抱到家里去了，可是待了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我还找到那个地方，我还照样趴在那儿，头还冲原来的方向，趴在那儿就是哭，谁劝也劝不好。我舅舅过来了，抱起我

就往家里走，我把他的衬衣都给撕了，一边哭一边闹着撕他的衣服。有人说：“他还得回来。”果不其然，我又回去了。可是人家这回早有准备了，他们把四个泥绷子蘸上水就铺在那儿了（泥绷子是一块布拴四个角，当地农民用来提泥的）。我哭着来到这儿一看，躺不下了，怎么办？我就绕着圈转，就那么转圈哭。

我父亲很顽固，经常打我，还叫校长打我。有一次，他让我给校长带去一封信，我当时还很得意呢，其实那封信是让校长打我。后来，我和母亲到文安县的姥姥家里去，到那儿，我就不回家了。母亲不能总住在娘家，住几天她就回去了，我就留下不走。家里一来人我就躲出去，饿着肚子躲在外面，几次都这样。一次，我爷爷来了，我又一天不回来，跟着一个拿火药枪的人打鸟去了。到了黑天，我回家进屋一看，哎呀，老头子坐在炕上呢，这回可糟糕了！老头子让我回家，我说：“不回家。”爷爷问：“为什么不回家？”我说：“他（指我父亲）总打我嘛。你要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回家。”爷爷问：“你都有什么条件？”我说：“不念书，不认字了，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不许他打我；第三条不管他叫爸爸；第四条不许他到屋子里睡觉。”爷爷说：“这怎么办呢？你叫他到哪里睡去？”我说：“家里不是养了一条大黄狗吗？叫他到狗窝里去睡。”爷爷听了哈哈大笑，他都答应了我。他说：“行啊，不念书了，不写字了，行，咱们都能做得。不许他打你，他再打你我就打他。”他笑笑又说：“不管他叫爸爸了。”

到家后，前面两条实现了，后面两条不好办，特别是不让他进屋睡觉就实现不了。我见他在屋里睡觉就哭开了，谁也哄不好。我问：“他为什么到屋里睡觉？我非叫他到狗窝里睡不可！”这不好办哪！从前吃饭，我趴在桌子上就吃。从那以后，我才不先上桌子呢，我一看他就讨厌，我先上桌子他挨着我坐怎么办？我就不好再躲了。我后上桌子，我看他坐这边，我就坐那边；他坐那边，我就坐这边。有时候，爷爷故意说：“吃饭了，叫你爸爸去！”从那以后，我出门就不再

喊他了，我就挨家找，找到了他，我就说：“叫你吃饭去呢。”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是在念私塾的时候。

我念小学的时候，拿着两个玉米面大饼子和几片咸菜，到离家四五里地远的县城上学。头几年，功课很好，总是头一、二名，没出过三名，到毕业考试时，答卷就用铅笔抹一抹，不在乎名次了。霸县县城有明朝修建的城墙、城门，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爬到城墙上去玩。城墙是斜坡修上去的。老师也常带我们到城墙上去给我们讲五四运动。这位老师我只知道他姓郝，他对我们很有影响。我读私塾的老师就是他的长辈。郝老师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我到哈尔滨后，家里托他给我写过信，我没回信。

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的第二年，可能是1923年春天，吴佩孚在郑州镇压工人罢工。就在那年，我去哈尔滨投奔姓李的一位乡亲。以找职业闯关东（为借口）骗取了父亲（的信任），家里给我二十块大洋做盘缠，我背着小行李卷，沿河边走去，边走边作诗。两天走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店。在临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前吃的焖酥鱼，真是香啊！到哈尔滨就没钱了。我原是买的联运票，到了长春又加快，这就分文皆无了。在火车上就抽烟，没吃没喝。到了哈尔滨，我就叫了辆车找到了姓李的乡亲。他的朋友在道外头道街开小店，当时叫半面街。西半面当时都是荒地，桥洞没修，我就住在小店里。最初很想家，也很想我的妹妹小翠，这时家里老来信。我想家，还想得很厉害，怎么办呢？我是一封信不回。家里又让我的祖母给我写信，牵动你的感情嘛。后来，来信我也不看就撕掉了，怕被感情征服，用一种人为的方法强制自己。有一封信是叫我的老师给我写的，信中说他在路上走，总有一人跟着他，跟着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后来，我

的父亲就求他给我写信。那个老师就是前面说的郝老师，他是教我们文学的，他的思想很进步。那正是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信上说，有一次我祖母听说我回来了，她听错了，跑出去不慎把腿摔断了。

那时，白天晚上脑子没闲着过，总是在考虑诗。我当警察，后来请假是很不容易请准的。我在去哈尔滨《晨光报》前考取了警察训练所。那时人们封建道德观念很强，我就编个理由，说到哈尔滨后，母亲死在哈尔滨，她的灵仍在哈尔滨。现在有一个同乡要回家，他愿意帮助我把母亲的灵迁回去，这个机会不能失。这一套非常投合他们的封建头脑。中东铁路特区警察处长文应兴说我是“孝子”，准假时他很佩服我的“忠孝”，其实是见鬼呢！我当警察是姓李的同乡出主意，让我投考警察训练所的。为了找职业糊口生活嘛，当警察约一年。地址在哈尔滨南岗大直街，所长是张焕相。他后来做了东北特区司令长官。

我在哈尔滨当警察站岗，一站五六个钟头，在岗上我就作诗，下霰子打在衣服上，等下岗回家，衣服变成白色，脱下的衣服都立着，冬天很冷啊！我请准假出来在小店住了几天后就到《晨光报》去了。在去《晨光报》前，因为我常给他们写文章，就是有这么个关系我才到《晨光报》去的。

在《晨光报》的生活很特别。每天编报、校对都是通宵，到天亮还不睡觉。工作完了，我就拿一本书到公园，躺在椅子上读诗，到十点多钟回家吃饭。我住在道外十四道街姚席九的房子。那条街有牌坊，十四道街口有个小饭馆，卖牛肉蒸饺，做得非常好，咬开后里面一包汤，两毛现洋就吃饱了。有一次，我和金剑啸在那儿吃牛肉蒸饺，他还吃蒜瓣儿。那次的印象总是那么新鲜，老也忘不了。那时他就跟《晨光报》有关系了，我们很早就熟了。这个时期，我常常夹着一本泰戈尔的诗，到太阳岛沙滩上读，读完了就睡着了。茅盾在国共

分裂后写的《幻灭》，凡新出版的如鲁迅的《彷徨》《呐喊》《狂人日记》都是那时读的。在《晨光报》那几年读书较多，打下了文学基础。

《晨光报》当时有袁弱水、芮道一。芮是日本留学生，和田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同学。1927年第一次我去上海是芮写了信叫我找田汉的。芮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资格，是山西人，和南汉宸是很老的朋友了，也是个“怪人”。他在山西太原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结了婚。他在哈尔滨时，他的这个老婆还在太原，跟一个北伐时期的国民党特务认识，后来生了孩子。她曾为此特意去了一趟哈尔滨，目的是使孩子合法化。芮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伤心透了。他说：“不就是因为老婆漂亮吗？现在我找个最丑的、没人要的女人。”于是，在哈尔滨又结了婚。“九一八”后他跑到山里联络土匪，说服土匪下山。在省教育厅当过特区督学。光复后，在沈阳编国民党的《扫荡报》，解放沈阳时被我方俘获。

那时，在道外滨江县（今属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督学，他结婚时熟人都去祝贺。我认为，结婚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去那么多人看什么？朋友有意思就送点儿什么，不送就拉倒。一次，我去他家玩，见屋里还坐一个女人，我也不招呼，装作看不见，玩一会儿就走了。现在，我家来了生人，不给介绍，是有点儿不近人情。这个影响是从韩乐然、苏子元那里来的。他们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轻易跟生人接触。那时，韩乐然、苏子元常到报馆来，郭涛光、于浣非也常来。抗战后在武汉救亡演剧一队，我碰到过郭涛光、于浣非，他俩还到旅馆来找过我。这两个人常给《晨光报》写稿，思想进步。于浣非当时是左派，开过医院，后来跟国民党有点儿什么关系。当时他们对我都很羡慕，能参加抗战宣传，无牵无挂的，而他们孩子老婆一大堆，拖累得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于浣非，不知于现在何处。据我以后在武汉见到廖沫沙，廖说：“自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于浣非，他跟爱人

在武汉见了一面后，他爱人就死了。”郭涛光病死在热河。傅天飞是韩乐然的学生，韩乐然很喜欢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当时傅天飞只有十几岁，那时他还在上学。抗日后，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韩乐然当时住在南岗的扶育小学，这个人很好。道外有个孙乐天开照相馆，韩刚到哈尔滨没有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帮他修版。我去上海时，韩乐然还给我写了信，叫我去找吴天。吴是美国留学生，住上海霞飞路。我去找过他，没给我什么帮助，以后也没见他有什么作为。

当时苏子元剃了个光头，胖胖的小矮个子，神神道道的，嘴里老嘀咕。他是哈尔滨道外青年会的干事，从奉天（沈阳）调来的。他没到哈尔滨就给《晨光报》写稿。当时在奉天还有几个人跟苏子元一道给我寄稿的。以后我在上海《申报》上见到他们和几个人被捕的消息。现在记不起那几个人的名字了。

《晨光报》的赵惜梦住南岗。我编《晨光报》副刊是接他的。有一天，我到他家去串门，进屋见他们在打牌，心里想：“真无聊，怎么打牌呀！”我把牌桌子给搦了，弄得人家好下不来台。当然，他们知道我是个“怪人”，也就不理会我。但我从那以后再不登他的家门了。后来，常提起此事，一说大家就笑。我当时真是觉得无聊透了。可是后来我也打牌了，怎么回事呢？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吃完了晚饭大家喜欢打牌、打扑克，我是在延安党校学会打牌的。不同的是，赵惜梦打牌是赌输赢的。

《晨光报》是一个很进步的私人办的白话报纸，开始进步，主编张树屏，当时的行为表现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他住在三十六棚，在三十六棚当过俄文翻译，跟工人运动很接近。东北反筑路运动、五卅运动、哈尔滨学生运动，他在《晨光报》上反映得很激烈。从这些反映上看，他的倾向很明显，不像无党派人士。但是，国共分裂后，他去了上海一趟，看了当时的形势很失望。他从南方回来，有很多日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地不说话，很消沉。他最初同情革命，大革命前，跟

党的关系很近，最后转了个大弯子，向右转了。张树屏这个人在“九一八”后，日本人进了哈尔滨，他就投敌做汉奸了。为敌人编报，成了汉奸报了，后来当了伪县长，东北解放时做了俘虏。1948年我在辽北学院时，是在四平接到过他一封信。信中说：“你现在一切很好，是革命的，而我却成了阶下囚了。”对前途充满了失望。我当即回了他一封信，这封信救了他。我在信中说：“来信收到了，感到你的情绪甚是低落，解放了，应该高兴嘛！”长春的公安局长是我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我让张树屏持我的信去找他，我对他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都跟他谈，谈得越彻底越好，不会有亏吃的。他就拿我的信找他去了。后来“镇压反革命”时都没动他。这封信真的救了他。“文革”之后，他在青艺的女儿说，他在农村靠打草绳子维持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的重大专案组找他写证明材料，他如实地写了，写得很好。因为他生活困难，政府还给了他一千元钱，他不要，过了不久他就死了。这个人还好，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情。

于森也是要去苏联的人。他们都与《晨光报》有关系。于森的照片我见过，他第一次去苏联走到黑龙江边被逮捕了，军阀要枪毙他，棺材都预备了，没毙了。他说：“这一次死也只有死了。但是，我还是要去苏联。”他在苏联清党中受过电刑。后来此人就无消息了。

晨光报社社长于芳洲是无党派。于的妹妹嫁给了张树屏。他们最早是给《哈尔滨商报》帮忙，后来从《商报》分出来办的《晨光报》。

1924年我进入《晨光报》任副刊《江边》^①主编，编副刊的还有一个叫范星火，抗战后在河南见过他一次。《晨光报》副刊《江边》，我去之前就有了。这名字没什么来历。在编这个副刊时期，我认识了

^①《晨光报》副刊1924年前名为《光之波动》，1925年改为《江边》，版面扩大，增加了《妇女》《社会》等栏目。

苏子元、韩乐然两位地下党员，由他俩提供稿件，曾先后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过瞿秋白、萧楚女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都是从南方通讯中转载的。萧楚女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从小就跟着毛主席，毛主席很喜欢他。他是黄鹤楼的一个茶房，没进过学校的，居然写得那么好的文章，后来在农民讲习所当教员，不得了哇！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我因发表一篇欢迎北伐军的文章，《国际协报》把这篇文章用红笔圈上，送到了警察厅，我们就遭到警察的逮捕。当时的五卅运动、反筑路运动，游行声势很大，道外正阳街都挤满了人。《晨光报》都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支持学生这一斗争。学生运动中扛大旗的叫高寿天，他是党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学牙科专业的，和于浣非是同期的学生。我的那把吉他就是高寿天经任白鸥送给我的。《晨光报》曾整版发表学生运动的照片，因此警察厅长期对《晨光报》恨之入骨，高其栋^①要搞我们，我们是他的对头。他们决心想搞掉《晨光报》，他们把我当成了共产党员。因为《晨光报》总经理于芳洲、主编张树屏都是道尹公署一科科长^②的学生，我们被逮捕后，一科长又运动了道尹蔡运生，由他出面营救。蔡亲赴奉天督军署，亲持证件向哈尔滨交涉，我们被拘留了三个月才获释出狱。我家现在还有一把泥壶，和这件事有点儿关系。这把泥壶就是高其栋的。这是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做的泥壶，他做泥壶非常有名。大概是送给一个妓女的吧，造型是乳形的。壶肚一面镌有“春雷香胸襟豁，望梅兮止渴。曼生”，另一面镌有“戊辰秋逸然轩主人”。壶盖里面镌有“莲记”两字，壶底四个字是“金莲提制”。高其栋放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就拿着这把壶一边喝着茶一边给我们讲话。东北光复后，我在哈尔滨小市上见到就买来了，留到现在。陈曼生当过县官，是清朝嘉庆年间人。

^① 高其栋是当时滨江县警察局局长。

三

《晨光报》停刊了，出狱后我也就失业了，于1927年8月经青岛赴上海。路费是在《晨光报》时的薪水，那时薪水不按月拿。我手里攒了几个钱够去上海的路费。我从哈尔滨起身穿棉袍，走到青岛脱下棉袍，到了上海过夏，一路上过了三个季节。我是从大连上船，乘“华山丸”去青岛。我的一个旅伴是做“帽子生意”的，同坐三等舱。等船一过青岛，他说：“我不是商人，我是装扮商人的。”闹了半天他装扮成商人做什么也没跟我讲。我到上海时，国共刚分裂，那很恐怖哇！找人都不敢见，找人就说“不在”。你跟询问的人谈话时，其他人就在旁边听着。我去找商务印书馆的人就是这样的。那时的上海看见穿列宁装的人就杀，在马路上看见就杀，是什么也不问的，这情况当时我是不知道。我刚到上海就穿着列宁装的，衣服上缀有镰刀、斧头的扣子，我还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呢！真是危险哪！

田汉是国共分裂后，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的。我考上海艺术大学连吃饭都没有钱，还上艺术大学！我跟田汉见面时流露出我很穷，刚从监狱里出来，没有钱交学费，连吃饭钱都没有，田汉说：“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他感到我很特别，说我是个“怪人”，所以他才收我。我一到上海住在青年会，因为上海青年会有一个干事去过哈尔滨，我在哈尔滨青年会跟他见过面，所以到了上海就去找他，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找他时他说：“咱们是一面之交。”我住在那里。开始我给青年会画招贴画，画了几天我就离开了。我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与文学。同年冬季，学校组织的游艺会，不知怎么田先生排戏时就把我添上了，要我演戏我就演吧，这是我第一次演戏。因为游艺会演出的既有文明戏（话剧），又有京剧，故由田汉先生取名曰“鱼龙会”。我在菊池宽著的日本著名话剧《父归》中演父亲。演出在

学校引起了很大轰动，看戏的有郭沫若、徐悲鸿、郁达夫、陆小曼、万籟天等。参加“鱼龙会”演出的还有欧阳予倩（饰潘金莲）与周信芳（饰武松）、高百岁（饰西门庆）合演的《潘金莲》，都是文艺界的大家伙，南国社就是从此开始的。我的舞台生涯也是从此开始的。说来奇怪，当时戏剧系的学生倒没有一个参加演出的，而我这个学美术的学生却成为红极一时的话剧名演员了。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演戏，票价卖一块钱一张票，很贵的呀！那次演出成为话剧史上一个很奇特的故事，那是开头嘛！看戏的只有一个人是外面的拿票来看戏的，那张票也绝不是他买的。那个人像个大师傅，穿着一身油垢的衣服，这个人看了《父归》哭着走的。徐志摩还写了一篇文章，赞赏演出获得成功。文章中写道：“一个穿油垢衣服的观众，看了《父归》，他那油垢的衣服又沾满了泪水。”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秋冬间的上海《申报》上。戏演了一半，田汉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很惊讶地看了演出。《人民戏剧》上曾发表过一篇材料说，田汉很惊讶，绝没有想到，他说：“……扮父亲的陈凝秋君的成功尤可记录，恐怕自有菊池此剧以来，即在日本演父亲的亦无有过凝秋者。”我呢，本来不是学戏剧的，我是学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哈尔滨就跟俄国人斯切潘诺夫学画，这个人住在南岗礼拜堂东边的一个大楼上。认识他是韩乐然给我介绍的，他跟我学中文，我跟他学画——学西洋画。我学画时曾画过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心，心上穿着一支箭，心也飞着，一边滴着血，底下是波浪滔天的大海。这幅画的名字叫《追寻》。我的第一部诗集便由此得名，是我这个时期为追求人生的真谛的一种反映。白俄画家、我的老师伊万诺夫看了很满意，说很有想象。我记得有一天，我去秋林附近这位老师家学习俄文，在回来路过南岗的时候已是夜里了，一个俄国乞丐在那里拉琴，天下着很大的雪，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很久，路上行人稀少，很宁静，我即兴写了一首诗，我把仅有的两角钱给了他，他还给我立正，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久久不能忘

却。在上海艺术大学我也是学画的，也不知怎么弄的，叫我演戏，我也不知道我能演戏。在《父归》中左明演大儿子，陈白尘演二儿子，唐叔明演女儿，周存贤（四川人）演母亲，我演父亲。这个戏的剧情是：一个父亲有一大堆孩子，他对孩子不负责任、不教育。他在外面胡闹，做生意，搞马戏班子，多年后落魄归来，他的二儿子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成长全凭自己的努力，拼死拼活地干才成长起来的。你，做父亲的一点儿责任都不负。”后来，父亲又离家出走了。

我演父亲，因为我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从家乡出来到哈尔滨《晨光报》做了编辑之后，我父亲到哈尔滨找我，我正在南岗画画，都没让他进我的屋。我跟他谈了许多关于哈尔滨学生运动和高其栋的事，他越觉得儿子大逆不道，反叛了。我们俩从道外走到许公路，就是现在的东北烈士馆附近，我说：“我往这边走了。”他说：“你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去。”就这样把父亲撂在马路上了，他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父亲这样无情呢？因为小的时候闹得很绝。我很小他们就给定了亲，把我的表妹许配给我，她比我小一岁，我见过一次面，没有印象，听说长得不怎么样。我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从此，我每天放了学，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片大坟地去躺着。每天每天都这样，直到天黑才回家。我就想怎样对待他们，怎样离开家，离开家之后我怎么办，怎么学习，一辈子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回家就跟他们吵。那是一个冬天，我一进屋，父亲让我脱掉棉衣，只穿一件小裤褂，父亲说：“你到街上跪着去！”我就在街上跪了几个钟头。那时我就想了，我要离开家。父子应该说是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吧，但是遇到矛盾的时候，触动了最顽固的封建礼教尊严的时候，还是你是你，他是他。这是极深的教育。

我离开家乡以后，跟任何朋友不谈家里的事，我在北方就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就说是北方人，不认乡亲，我很讨厌乡亲拉帮结伙。

为什么田汉对我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我刚从哈尔滨监狱出来不久就来到上海。有这样的经历，演《父归》时的感情就不得了啦，就像决了口子一样，要说演剧技术我没有，我没有学过戏剧嘛！就是生活整个突出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演得那么成功。徐志摩的文章说：“只有一个观众哭着走的。”我就演过一个观众的戏。那时的精神真是特别，不怕一个人没有，一沾艺术的边就很严肃。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看了演出之后，芥川说：“在日本从来没有人演得这样好。”这个戏演了四十多分钟，陆小曼就哭了四十多分钟。戏散后，她跑到田汉的办公室又哭起来了。哎呀，她简直哭哇哭得没治了，那不是看戏，不知怎么触动她的感情了。

演出是在一个礼堂里，舞台口比一间房子宽一点儿，幕布是用被面拉上的。那时，什么也没有，所以在话剧史上是一次极特别的演出，成为永久的笑话，有名的笑话！我演过《父归》之后，唐槐秋、顾梦鹤他们就模仿着背我的台词，赵丹是不知道这一次演出的。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放春假去旅行，去玩，到了杭州才想到演戏。田汉先生说：“哎，我们演演戏好不好哇？”大家表示同意，现让田洪回上海取东西。我们当时住在李公祠。一天晚上，他们正在讲鬼的故事，讲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推门进去了，以为真有什么怪东西跑进来了，把有的女同学吓得要死，原来是一场误会。田先生根据这些就编写了《湖上的悲剧》。他是在西湖上的一只游船上开始写的这个戏。天下着雨，田先生写着写着就说想喝点儿酒，就凑钱买酒，又没钱买下酒菜，就先买了两瓶酒。好，两瓶酒喝完了，还想喝，可是没钱了怎么办？拿瓶子去换，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自己不好意思去，就请船夫去换。田先生写《湖上的悲剧》没有打草稿，就直接刻在蜡版上，刻好了就印刷，印好了马上就排。田先生真是少有的快手哇！几天就写出来了，边排边修改。实际上，这个剧本最后是集体创作，它

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南国艺术学院从这就开始演戏了。

我在1927年到1928年，在上海艺大学习时，常给太阳社写诗，署名陈凝秋，太阳社刚创立，我就给他们写诗，给他们写了很多诗。我的长诗《追寻》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其后，泰东书局以同名出版了单行本诗集。那时潘梓年在上海霞飞路办了一个潮山书店，出个刊物叫《潮山》（半月刊），也为它写过诗。我还见过潘梓年一面，给他写的诗有一首是《一朵小花》，意思我还记得：

我是春风带来的一粒种子，
被丢在阴幽的坟地，
我悄悄地生长，
我悄悄地开花……

总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些东西是很伤感的。

当时我住在吕霞光家里，他家就在上海艺大对面。他是个阔少爷，学画画的。我住在他家地板上。他老是问我海陆丰彭湃的事，我不知道他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便搪塞地说不知道。他说彭湃闹得很厉害。那时，主要是读了很多高尔基的作品，尤其是读了《我的童年》之后，在思想上受的影响最大。那是1928年冬，当时我的思想很苦恼，因为不能跟任何人商量，所以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回哈尔滨，没有跟任何人闹翻，没跟田汉辞行就走了，这是很不通情理的。在田汉的脑子里一定产生了疑问，在他看来，我走是自由主义，恋爱问题。我向往十月革命的苏联，萌生了去苏联的念头。我到了哈尔滨，没地方住，任作田（基督徒）在道外办了一个“寄宿舍”，他帮助我住在青年会的寄宿舍。他在同记工厂做业余教育工作，跟武伯祥很接近。他把我介绍给武伯祥当秘书。当时的工作就是他讲他的经商经验，每周